

《牛虻》人物身份符号及角色关系：语义分析和叙述修辞

Identity Construction Rhetoric and Character Roles in *The Gadfly*: A Semantic and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谭学纯 (Tan Xuechun)

内容摘要：整合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以广义修辞观重释经典，分析《牛虻》人物身份符号及角色关系位移中的语义成分和叙述修辞。研究认为：作品人物的每一种身份都分别与“他者”构成特定的角色关系，并在其归属的角色关系中被定义。同一个体的不同身份，进入角色关系A或B，产生角色关系位移，后者反过来影响或制约身份主体的言语行为。身份主体分化出的不同自我，以身份叠现和链接的方式，实现主体缺席的在场。《牛虻》的叙述不限于革命故事或伦理故事非此即彼的选项，而是融入了多种元素：文本的伦理表达、宗教表达、爱情表达、性表达，以及亚瑟/牛虻和两个女人性爱分离的表达，与革命的复杂纠葛及修辞处理，强化了叙述张力，也影响了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文本间性和修辞选择。

关键词：身份符号；角色关系位移；语义分析；叙述能量；广义修辞

作者简介：谭学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修辞学、文艺美学。倡导并实践打通学科界限、融入学科大生态的广义修辞学研究，代表性系列论著《广义修辞学》《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本文系福建师范大学“跨文化话语与修辞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之一。

Tit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Rhetoric and Character Roles in *The Gadfly*: A Semantic and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he classic novel *The Gadf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by combining linguistics with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narratological rhetoric in pers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 role shif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one particular personal identity of each character is constructed in relation to the

particular role of another character, thus defin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characters. Th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a character in relation to personal role A or role B he/she simultaneously plays, generates role relationship changes which in turn impact or constrain the discourse acts of the characters. The varying identitie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presented in the crisscros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serve to achieve the presence of the concealed character identities. The discourse in *The Gadfly* is not just confined to revolutionary theme development or ethical discussion; it also features religious, love, sexual relation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The rhe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 Arthur (the eponymous Gadfly) and the two women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involved revolutionary theme of the novel, provides narratological dynamics to the novel, generating an impact on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rhetorical choices of the text in the sens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identity rhetoric; shift of role relationship; semantic analysis; narratological dynamics;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Author: Tan Xuechun is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and discipline leader of the PhD programme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rhetoric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promoting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by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to its bordering disciplines. Works he has published include: *Theory of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Domain of the Theory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Talks on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and *Question-driven Approaches in Rhetoric in a Broad Sense*. Email: fsdtxc@fjnu.edu.cn

一、解读《牛虻》：刘小枫质疑主流观点及本文分析思路

在诸多研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小说《牛虻》的学术文献中，刘小枫较早地指认《牛虻》讲述的“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42）。他的《沉重的肉身》透过革命故事，挖掘私人痛苦，体现学术观察与阐释的伦理维度。¹该书第二章标题很别致：“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这样的标题

1 《沉重的肉身》以“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为副标题，体现文学批评的伦理维度，不等于作为批评范式的伦理学批评，后者需要一套基本理论和学术概念、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4（2005）：16-24+169。另参见鹿晓燕、高万云：“修辞学研究之方法论变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2017）：97-106。

设计,预示了不同于革命故事讲法的学术叙述路径:“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述自己的故事,使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拆开丽莲编织的叙事”(刘小枫 44)。《沉重的肉身》“拆开丽莲编织的叙事”,将电影《罗生门》式的多元叙述,转换成学术文本的伦理叙述:让《牛虻》中的人物如绮达、玛梯尼、琼玛、蒙泰尼里、亚瑟(牛虻)从伏尼契的叙述结构中抽身而出,轮番讲述自己的故事。视点各异的讲述,共同为刘小枫代言,质疑牛虻的“革命神话”(68),同时质疑有关《牛虻》研究的主流声音。¹

《沉重的肉身》出版于 1999 年,以此为时间界标,向前追溯,可以从刘小枫的质疑,反向地推导:此前存在着将亚瑟——牛虻的成长主题纳入革命叙述的主流认知,否则不足以驱动刘小枫选用“不是……而是……”的论证框架。刘小枫的“不是”,指向主流认知;“而是”重建刘小枫的认知。如果从 1999 年往后观察,《沉重的肉身》出版至今,见于 CSSCI 来源期刊对应“牛虻”主题词搜索的研究记录共 11 条,去除无关联或弱关联的文献 2 篇、有关话剧《牛虻》演出空间和艺术表现的文献 3 篇,其他 6 篇文献不同程度地涉及小说《牛虻》的翻译伦理、翻译诗学、翻译政治、反宗教主题、以及《牛虻》的经典化过程。²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小枫解读《牛虻》,冲击了旧有认知,丰富了新的认知。后者同时丰富了学术文体的存在方式,一改作者《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的艰涩,转向学术随笔的叙述自由。从问题驱动到文本呈现³,《沉重的肉身》从学院派文风洒脱转身,变换了思考方向和表达策略,在世纪之交早早地提交了讲好学术故事的生动个案。

刘小枫质疑主流观点的论证策略是超越伏尼契叙述的统一视点,让小说中不同的认知主体,以不同的视点讲述自己的故事。但问题也存在需要挖掘与解释的另一面:“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不是抽象的身份主

1 主流声音至今清晰,201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牛虻》汉译删节本初版 60 年之际推出全译本,从出版社“写在前面”的话、译者夫人董荷英所写“后记”、倪震所写《我为〈牛虻〉作插图》,可以读出《牛虻》副文本对革命主题的当代表达,封底广告更凸显该书影响几代中国人的“英雄情怀”。

2 参见刘嘉:“五三版《牛虻》译著的叙事建构及翻译伦理探微”,《外国语》2(2015) 65-72;杨柳:“翻译的诗学变脸”,《中国翻译》6(2009):42-47+93;倪秀华:“翻译:一种文化政治行为——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译介《牛虻》之现象透析”,《中国比较文学》1(2005):121-136;卢玉玲:“不只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也谈《牛虻》的经典之路”,《中国比较文学》3(2005):181-193;朱安博:“翻译文学的重构与新生——《牛虻》的经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2008):264-266。

3 参见陈新仁:“语用学研究:学术创新与文本呈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2017):90-96。

体,也不是单一的身份主体。事实上,作品人物的每一种身份,分别与不同的“他者”构成特定的角色关系,并在此时此地归属的角色关系中被定义。同一个体的不同身份,进入角色关系A或角色关系B,产生角色关系位移,角色关系位移又反过来影响或制约身份主体的言语行为。以亚瑟为例,他是蒙泰尼里的学生、私生子、琼玛的初恋;亚瑟成为牛虻,是琼玛成为波拉太太之后的暗恋,同时又是绮达的情人;从亚瑟到牛虻,是从波拉到玛梯尼的情敌+革命伙伴。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牛虻》的叙述不限于革命故事抑或伦理故事非此即彼的选项,而是融入了多种元素:伦理、宗教、革命、爱情、性……《牛虻》的伦理表达、宗教表达、爱情表达、性表达,以及亚瑟/牛虻和两个女人性爱分离的表达,与革命的复杂纠葛及修辞处理,强化了文本的叙述张力。

从以上认知出发,本文换一种分析思路致敬经典:考察《牛虻》的人物身份如何汇聚为不同的角色关系?体现不同角色关系的身份符号,与具有不同语义特征的角色关系位移以及相应的修辞处理如何推动文本叙述?如何积蓄并最终引爆文本的叙述能量?

区别于一般的叙述学研究,本文整合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以广义修辞观¹,重释《牛虻》。版本依据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李俚民全译本。

二、亚瑟/牛虻和两个神父的角色关系:语义分析及叙述修辞

“亚瑟”和“牛虻”,是同一身份主体不同的身份符号。亚瑟被捕时,逮捕证上写着“亚瑟·勃尔顿”,并以“勃尔顿先生”的名义受审,但“勃尔顿”是亚瑟有名无实的身份符号。有名无实对亚瑟来说,隐藏着爆炸性的身份信息。敏感的读者会注意到文本初始叙述的修辞暗示:“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总是含着一种爱意”(伏尼契3)的“蒙泰尼里”,是一个能指、两个所指,蒙泰尼里与亚瑟的关系可以用语言学的义素分析标示为双重角色:[+教父+生父] (“[]”内的“+/-”表示具有或不具有某种义素,下同)。

亚瑟起初没有察觉:教父代上帝立言的同时,遮蔽着本真的自我;生父部分地袒露着真实的自我,但教父的角色身份,又每每使他在以生父的身份发言时,不可能真正地敞开本真的自我。于是蒙泰尼里与亚瑟的对话,常常袒露中有遮蔽。亚瑟原以为生父缺席,教父是他心目中父亲的象征性替代。亚瑟的生父想象,在自己身世解密后成为他不敢想象的现实。文本中有一处修辞细节:两位英国画家议论亚瑟和蒙泰尼里相貌酷似,亚瑟认为那两人很蠢,但又愿意自己能够像画家假设的那样。亚瑟向蒙泰尼里表达自己听到的

1 参见笔者:“中国修辞学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文艺研究》12(2009):39-48;“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5(2015):50-57。

画家议论以及自己的内心想法——“我要真是你的侄儿才好呢……神父”（伏尼契 22），蒙泰尼里听后脸色惨白——这是昭示人伦血脉的生物学表达。

解密人伦关系的叙述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另一个神父“卡尔迪”，这个身份符号同样是一个能指、两个所指，一显一隐，用义素分析记作[+神父+密探]。作为蒙泰尼里的继任，卡尔迪在《牛虻》中出场很少，但很重要。表面上，亚瑟与卡尔迪的角色关系，是亚瑟与蒙泰尼里显性角色关系的另一个版本，但这个版本掩盖了一种危险的角色关系。卡尔迪的显性身份利用了亚瑟的宗教忏悔，隐性身份将亚瑟的宗教忏悔变脸为密探的诱供。

亚瑟与卡尔迪的角色关系开启了一个纯情青年的噩梦，接踵而来的是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亚瑟向卡尔迪忏悔对情敌+革命伙伴波拉的不满→卡尔迪告密→亚瑟、波拉被捕→恋人琼玛打亚瑟耳光→兄嫂揭秘亚瑟的私生子身份→亚瑟的上帝被两个神父击碎→亚瑟退场→“后亚瑟”时代“牛虻”出场，但亚瑟和牛虻的身份不时地叠现、链接，直至牛虻死于枪杀，亚瑟才真的死亡（亚瑟—牛虻来到和离开人世，在上帝注视下发生）→虔信上帝的红衣主教、亚瑟生父因此发疯而死。

卡尔迪一显一隐的身份合谋产生的叙述动力，改变了文本的叙述走向：公开蒙泰尼里作为亚瑟生父的隐性身份，是文本建构层面的一个修辞信号，表明从此刻开始，文本原初定义的“亚瑟—蒙泰尼里”的角色关系将按照偏向不和谐的复杂情境重新设计。作者将设计蒙泰尼里的自我分裂，蒙泰尼里将承受自我分裂。与此相应的角色关系，将在新的修辞情境中展开。这一切，在卡尔迪出场之前，只是隐藏的危机，是卡尔迪的双重身份使隐藏的危机暴露出来。

亚瑟向卡尔迪忏悔的部分内容在客观上导致他本人和波拉被捕，为此，琼玛一记耳光，将亚瑟打出了“亚瑟—琼玛”的角色关系。兄嫂解密亚瑟身份的隐秘档案，使亚瑟与蒙泰里尼从原先的神父与神学生的宗教关系，置换为伦理关系，并产生了当事人在血缘意义上角色关系的位移：从富商之子，位移至神父之子。

这种角色关系位移对文本的叙述结构和修辞化展开至关重要，生父缺位被填空，自此亚瑟的身份由敬仰蒙泰尼里的神学生转换为敬仰对象的私生子。身份转换的叙述动能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唤醒了亚瑟的仇父情结；（2）扭断了他的恋母情结；（3）摧毁了他的上帝信仰：“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用谎话欺骗我”（伏尼契 78）。这是亚瑟写给蒙泰尼里的信，并让收信人到船港码头收尸，其实是亚瑟制造的自杀假象，或者是身份符号意义上的“亚

瑟之死”。卸下“亚瑟”的身份符号，实际上是卸下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文本叙述由此进入“后亚瑟”时代，“亚瑟”换用“牛虻”或“列瓦雷士”的身份符号。

言辞犀利的“牛虻”，是“列瓦雷士”发表政治评论的署名。虽然“牛虻”和“列瓦雷士”在很多叙述单元共同在场，两个身份符号指向的身份主体没有语义差异，但是二者功能有别：

(1) “牛虻”的身份符号整体地影响、制约《牛虻》的叙述结构；“列瓦雷士”只具有调节文本局部叙述的修辞功能。前者属于“结构性身份符号”；后者属于“非结构性身份符号”。¹也许能够为这种功能区分佐证的是：伏尼契让“牛虻”较多地出现在叙述话语中，而让“列瓦雷士”较多地出现在叙述对象的话语中。

(2) “牛虻”的身份符号比“列瓦雷士”更能凸显身份主体的在场形象，就像“鲁迅”比“周树人”更能凸显身份主体的在场形象。

所以，下文的分析忽略“列瓦雷士”。这样更利于阐释“亚瑟/牛虻”的身份符号变化所建构的不同角色关系。

在新的角色关系中，亚瑟对教父蒙泰尼里的爱，转化成牛虻对生父蒙泰尼里的恨>爱。生父使亚瑟背上私生子的十字架；但牛虻却在向死而生的最后时刻，用生命动员生父取下教父的十字架：

如果你爱我，就把你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下来，跟我一起走。……如果你觉得这个木雕的偶像比我更值得你去爱——那么，你到上校那儿去，告诉他，你赞成他的要求。（伏尼契 318-319）

教父爱上了亚瑟的母亲，却没有勇气担当这份感情，没有与葛兰第斯结婚；上帝信仰捆绑了亚瑟的忏悔，导致亚瑟和同伴入狱，由此导致亚瑟对教父长达十多年的恨，但最后仍转换成牛虻死前内心涌动的对生父的爱的暗流。文本中一个修辞细节传达了牛虻最后时刻的感情：他捡起探监的蒙泰尼里落在地上的手绢，流泪亲吻。吻的是物，情感指向物主，传递的修辞信息是：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将割断的血缘情感，仍然撕扯着“亚瑟/牛虻—蒙泰尼里”内心深处的伦理页面。

文本中，亚瑟和蒙泰尼里的上帝信仰都以先正后负的形式显现，但相同的转化轨迹背后是不同的转化动因：亚瑟的上帝信仰由正转负，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视为上帝化身的教父是自己的生父，自己被两个神父先后代言的上帝欺骗；蒙泰尼里的上帝信仰由正转负，是因为他虔信的上帝坐视信徒的亲子被枪杀。亚瑟之后，牛虻以伦理关系（亲子身份）劝蒙泰尼里放弃上帝；蒙

1 参见笔者：“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文艺研究》5（2008）：39-46。

泰尼里则以伦理关系（生父身份）劝牛虻放弃革命。在特殊的修辞情境中（阴森的牢狱空间和牛虻赴刑前的生命时间），“伦理—宗教/革命”的对垒，以伦理关系的破碎收场。作为这种收场的结果，是牛虻坚守革命至死；蒙泰尼里质疑上帝发疯致死。

文本围绕亚瑟/牛虻的叙述路线，用义素分析标示为[+伦理+宗教-宗教+革命]；围绕蒙泰尼里的叙述路线，则为[+伦理+宗教-宗教-革命]。两条叙述路线在“亚瑟/牛虻—蒙泰尼里”的角色关系中合拢为[±伦理±宗教±革命]。卡尔迪在小说中的短暂戏份是推动这两条叙述路线合拢的修辞安排。

三、亚瑟/牛虻和两个女人的角色关系：语义分析及叙述修辞

从亚瑟到牛虻，在文本叙述中，对应于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有爱无性”和“有性无爱”的修辞设计。琼玛（波拉太太）和绮达，是亚瑟（牛虻）的女人。角色关系的语义要素互为有无，义素分析可以显示两种角色关系的差异：

亚瑟/牛虻—琼玛（波拉太太）	[+ 爱情伴侣 - 性伴侣 + 革命伙伴]
牛虻—绮达	[- 爱情伴侣 + 性伴侣 - 革命伙伴]

琼玛的身份是[+亚瑟女友+波拉太太+牛虻的暗恋]，从琼玛到波拉太太，同一个女人是从亚瑟到牛虻爱情的唯一。文本叙述这样的场面：牛虻跪在琼玛面前，脸埋在她的裙子里，内心呼叫着，希望自己回归琼玛的亚瑟；但曾经被琼玛误伤害的亚瑟，以牛虻的身份喊出了另一种声音，不要忘了眼前这个女人曾经一记耳光把自己打进了地狱。那个曾经叫亚瑟的神学院学生，对琼玛的爱在牛虻的血液里流淌。十几年前亚瑟的女友琼玛，转换成波拉太太，她对亚瑟和牛虻身份关联的认知处于灰色地带，这种灰色认知延续在文本第二、三部，直到牛虻牺牲。此前虽然她有时觉得牛虻像是亚瑟，但不能肯定牛虻就是亚瑟。牛虻赴刑前，在狱中留给波拉太太的遗书中，重返“亚瑟—琼玛”的角色关系，重温了他和她儿时熟稔的小诗。信的结尾没有署名，但信的内容帮助波拉太太确认了牛虻即她的亚瑟。牛虻在遗书中称波拉太太为“亲爱的琼”，这个只与亲密的少年伙伴共享的名字，是亚瑟对琼玛的爱情呼叫；而琼玛，也在牛虻身上找回了失去的亚瑟。也许“亚瑟+牛虻”，才是琼玛（波拉太太）完整的爱，文本的爱情叙述因此更为丰满。

不同于琼玛（波拉太太）全程介入“亚瑟—牛虻”的爱情世界，绮达在“后亚瑟”时代进入“牛虻”的生活。这位流浪的吉普赛女郎为牛虻而生，为牛虻而爱，也为牛虻中断了她的爱。她离开牛虻之前、让母亲带给牛虻的告白，带着动人的野性：“我是一个女人，我是爱过他的，就为了这个缘故，

我不愿意再做他的婊子了”(伏尼契 236)。绮达不是牛虻的爱情伴侣,也不是作为牛虻革命伙伴的异性形象,只是性伴侣。她的野性的美丽,是牛虻革命活动的玫瑰客栈。由于绮达与牛虻的角色关系中具有[- 爱情伴侣- 革命伙伴+ 性伴侣]的义素,所以“革命”有时成了与绮达抢夺牛虻的符号。绮达不掩饰对牛虻革命伙伴的不满:“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把他从我手里抢过去呀?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透你们了!”(伏尼契 171)

《牛虻》“性爱分离”的叙述修辞同样需要在角色关系中观察与解释。

在文本内部,性爱分离对应于不同角色关系的两性在场模式:牛虻的荷尔蒙给了绮达;他的爱,给了琼玛——波拉太太。而琼玛,身体成为波拉太太,内心的爱情收藏属于亚瑟。波拉夫妻复制了波拉太太曾指责的“牛虻——绮达”角色关系中[- 爱+ 性]的义素,但不是简单复制,差异在于:

(1)“牛虻——绮达”角色关系中的[- 革命]义素,在“波拉——琼玛(波拉太太)”的角色关系中置换为[+ 革命]的义素。

(2)“牛虻——绮达”角色关系中的[+ 同居]义素,在“波拉——琼玛(波拉太太)”的角色关系中置换为[+ 婚姻]的义素。

“革命”“同居”“婚姻”,包装了合情或合法的性关系,失去波拉的波拉太太抱愧地终结了她指责过的有性无爱;但是失去亚瑟的琼玛无法终结初恋的感情。文本叙述牛虻与波拉太太的故事,修辞化地包装了亚瑟对琼玛的爱,以及亚瑟——牛虻的爱情接力和从琼玛到波拉太太的终身之恋。

在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可以从热奈特所说“承文本”角度¹,审视《牛虻》“性爱分离”叙述修辞的文本间性:“亚瑟/牛虻——琼玛”的角色关系是[+ 革命+ 爱情- 性],从亚瑟到牛虻,总共两次吻过自己一生爱着的女人,一次亲吻琼玛的手,一次亲吻写有琼玛名字的信。这种[- 性]的爱情圣洁化修辞,此后在跨时空的红色小说中过度消费:在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叙述保尔与丽达的爱情片段中;在中国十七年红色小说《林海雪原》《战斗中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等男女正面角色的爱情叙述中,我们一再读到[+ 革命+ 爱情- 性]的互文性镜像。而在“牛虻——绮达”的角色关系中,消除了[+ 革命+ 爱情]同时升华的因子,[+ 性]作为“牛虻——绮达”角色关系的纽带,被视为对革命者的“污化”,因而不但被前苏联拍摄的同名电影删除,也被赞赏《牛虻》革命主题的中国当代红色小说的爱情叙述所删除。但无法删除的,是“沉重的肉身”,以至于刘小枫追问身体伦理,提炼了一个极有冲击力的标题:“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44)。

四、亚瑟/牛虻和两个委屈的男人的角色关系:语义分析及叙述修辞

1 即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参见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74-75。另参见姚远:“基于篇际关系的承文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2017):114-120。

如果说在“牛虻—绮达”的角色关系中“革命”是绮达的“情敌”（刘小枫 46）；那么在“亚瑟／牛虻—波拉、玛梯尼”的角色关系中，“革命”则是“情敌”们与“亚瑟／牛虻”共同的磁场。前者导致绮达疏远“革命”并最终离开牛虻；后者表现为“亚瑟／牛虻—波拉、玛梯尼”的角色冲突与妥协并存。

从爱情角色观察，亚瑟在琼玛心中的分量比波拉更重，但琼玛却为波拉向亚瑟实施暴力，暴力背后的逻辑是“以革命的名义”，而不是“以爱情的名义”。爱情博弈中，亚瑟不喜欢波拉，牛虻和马梯尼的关系也很微妙，然而委屈的是波拉和马梯尼。亚瑟活着或“死了”，都是波拉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带着对亚瑟之爱和为亚瑟之“死”长期负疚的心结，在角色关系的位移中，亚瑟假死演变为牛虻真亡。而牛虻真亡，凸显了牛虻的另一个情敌玛梯尼对波拉太太没有结果的真爱。失去牛虻（亚瑟）的琼玛的精神抚慰，由牛虻的情敌玛梯尼完成。牛虻（亚瑟）和玛梯尼，两个男人的暗恋指向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初恋。读到牛虻（亚瑟）的遗书，哭成泪人的波拉太太，被玛梯尼真情相拥，但是玛梯尼不可能接续琼玛失去的爱，波拉太太对玛梯尼的回应，似乎比对波拉更理性：她曾经向波拉交出的身体，虽然被玛梯尼抱在怀中，却仍然属于自己。她的爱给了亚瑟，以及承认了亚瑟身份的牛虻。而波拉太太，也随之回到了琼玛的身份。这是文本叙述最后呈献给读者的悲情结局。

但在革命共同体中，“亚瑟／牛虻”和“波拉、玛梯尼”之间的同质性超越了差异性。爱情的常态空间是二人包厢，情敌导致二人 KTV 拥挤，势必产生摩擦。文本没有让保卫爱情酿成男人之间的战争，是由于叙述修辞为“情敌”暗战设定了可以被“革命”包容的限度，“情敌”在革命共同体中获得某种授权，使得爱情角逐中不相容的竞争者始终在革命方向一致的跑道上前行。

不过，同为情敌+革命伙伴的“亚瑟—波拉”和“牛虻—玛梯尼”的角色关系，只是表面上义素相同。这种表面相同掩盖着角色关系的构成元素相异，“亚瑟”和“牛虻”互为“他者”，与不同时段的两个情敌构成不同的角色关系，“亚瑟—波拉”的情敌关系，在“后亚瑟”时代发生在“牛虻—玛梯尼”之间，是文本叙述的另一种修辞设计。

五、身份叠现和链接：叙述能量的积蓄与爆发

“身份叠现”是我杜撰的术语，指的是身份主体分化为先后相继的不同自我，后一个自我出场时，前一个自我被“召回”，叠现于后一个自我。亚瑟在《牛虻》的叙述话语中分化，亚瑟成为牛虻，亚瑟仍时隐时现地叠现于牛虻身份。同样，琼玛成为波拉太太，琼玛仍时隐时现地叠现于波拉太太身份。身份主体对此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需要将同一个身份主体叠现出的不同自我链接在一起，才能确认某种角色关系中无法被替

代的那个角色。正是这种身份叠现和链接，不断积蓄并最终引爆了《牛虻》的叙述能量。

《牛虻》的叙述结构和“亚瑟 / 牛虻”身份符号的变化简为下表：

表 1

一级结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尾声
二级结构	一至七章	一至十一章	一至八章	
身份符号	亚瑟	牛虻（亚瑟）		

羞于自己私生子身份的亚瑟，假死于第一部第七章，身份符号并没有退出文本。成为牛虻的亚瑟，重建的另一个自我，换用了“牛虻”的身份符号，但“牛虻”并有取代“亚瑟”。与此相类的是成为波拉太太的琼玛也没有退场，“琼玛”的身份符号与波拉太太交替出现。

从第二部直至结尾，不是“亚瑟 / 牛虻”的替代式推进，而是在“亚瑟 — 牛虻”的身份叠现与链接中延伸。如果说亚瑟的私生子身份隐匿为这一身份的公开积蓄了文本第一部叙述能量爆发的力量；那么“亚瑟 — 牛虻”的身份叠现与链接则积蓄了第二部至结尾的几次爆发能量。

第一部结束时退场的“亚瑟”，在作家的修辞加工中以新的身份在第二、三部出场。第二部“牛虻”出场，成为牛虻的亚瑟并没有退场，“亚瑟”的身份符号仍高频复现；同样，第八章牛虻与琼玛的对话中，亚瑟缺席的在场，诉说着琼玛心中的痛。第九章琼玛捧着亚瑟少年的照片，追忆往事，牛虻走进房间，捡起琼玛惊吓中掉在地上的亚瑟照片。成为牛虻的亚瑟和成为波拉太太的琼玛，缺席地参与了下面的对话：

“这就是我那天告诉过你的那个朋友在儿童时代拍的照片……”

“就是你杀死的那一个吗？”

她不由得颤抖了一下。他把这个“杀”字说得多么轻飘，多么残酷啊！

“是的，我杀死的那一个——如果他真的死了。”

“如果？”

她仍旧注视着他的脸。

“我有时候是怀疑过的，”她说，“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他可能也像你一样，从家里跑出去，跑到南美去了。”（伏尼契 196-197）

对话中不在场的亚瑟成为在场的牛虻，但是牛虻的精神世界里，隐现着那个不曾死去的亚瑟；同样，对话中不在场的琼玛成为在场的波拉太太，但是她的精神世界里，隐现着那个忘不了亚瑟的琼玛。

身份叠现也让读者看到了蒙泰尼里的两个自我：一个蒙泰尼里短时间地

返回自然本性，释放人的世俗欲望；另一个蒙泰尼里长时间地戴着人格面具，在神的世界端坐。短时取下面具和长期戴着面具的蒙泰尼里，叠现在蒙泰尼里的身份符号中，人的世俗生存，在神的戒律中产生空间折叠。亚瑟兄嫂在亚瑟面前撕裂了蒙泰尼里的面具，但在蒙泰尼里面前不轻易触碰这个面具。这种微妙的角色关系推动着文本叙述在透明和晦暗交叉的轨道上运行：透明的是卸下亚瑟身份的神父之子和神父都知道某种秘密，晦暗的是两人都以为对方不知道某种秘密。原先蒙泰尼里知道亚瑟是自己的儿子，但亚瑟不知情；后来，亚瑟知道了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但蒙泰尼里不知道亚瑟已经知情。儿子看到了面具被撕裂的父亲，父亲以为儿子不知情而不能摘下面具。这种修辞处理贯穿于从亚瑟退场到牛虻出场后的大部分叙述空间。

“亚瑟—蒙泰尼里”在“宗教关系 ↔ 伦理关系”的位移中，透露出蒙泰尼里对亚瑟与革命伙伴关系的紧张感。第一章结尾，蒙泰尼里引自《圣经》之语的内心独白，暗示了伦理关系破碎的结局——“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伏尼契 12）

第三部第四章，亚瑟以进入蒙泰尼里梦境的形式，分享牛虻的活动空间。第六章叙述蒙泰尼里与牛虻的牢房对话，亚瑟和牛虻交替出现。“牛虻”用作他称，出现在叙述话语中；“亚瑟”分别用作面称和自称，出现在蒙泰尼里和牛虻的对话中。语用频率见下表：

表 2

身份符号	语用主体	语用频率
牛虻（他称）	叙述者	47 次
亚瑟（自称）	牛虻	1 次
亚瑟（面称）	蒙泰尼里	16 次

“亚瑟”分别用作面称和自称，是牢房对话中极具修辞蕴含的身份符号。自称，是牛虻在瞬间重返亚瑟；面称，意味着十多年前随同亚瑟一起消失的“亚瑟”身份符号，在牢房里不再隐形，并且由生父 16 次喊出。但伏尼契在叙述这一场景时，极为冷峻。作家清醒地知道，此时的牛虻，只能短时链接亚瑟，不可能重回当年那个纯情的亚瑟：

（蒙泰尼里）“亚瑟！”（叙述者）这是一种真正感到恐怖的呼声，但是牛虻不理它，只管说下去：“……你和我站在一个深渊的两边，要想隔着它携手是办不到的。”（伏尼契 316）

随着“牛虻（亚瑟）”之死，文本叙述向高潮推进。第三部第八章以蒙泰尼里为上帝代言开场，但是面向教士与信众朗读的赞美诗每每幻化为对“亚

瑟(儿子)”的呼喊,“亚瑟”的身份符号在整部小说中积蓄的能量,终于爆发:

“难道你真的睡熟了吗?亲爱的儿子?你竟永远不醒了吗?难道那个坟墓竟这样爱惜它的胜利,树下那个黑色的深坑竟一点都不肯放松你了吗,我心爱的人啊?

.....

“啊,亚瑟,亚瑟。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爱呢!如果有人牺牲了他最心爱的人的生命,那不是比这更大吗?”(伏尼契 340-341)

.....

这时他已经把那盛着圣体的瓮子抓在手中,高高举到头顶,说到最后那一句话,便把它往地上狠命一摔。随着金属碰到石板地上发出的一阵响声,旁边那些教士便一拥上前,二十多只手一齐把这个疯子捉住了。(伏尼契 348)

经过修辞加工的现实与幻象在“宗教关系 ↔ 伦理关系”之间往返位移,留下在“宗教”与“伦理”之间挣扎的身份主体,及其在不同的角色关系中漂移的灵魂。伴随蒙泰尼里疯癫的呼叫,“亚瑟”身份符号积蓄的能量总爆发,一个植入世界文学经典影像记忆的悲剧故事落幕。

疯癫的蒙泰尼里死于小说“尾声”,一纸讣告书写了红衣主教的弃世形象。他在上帝注视下呼喊私生的“亚瑟”,连同琼玛读遗书确认“亚瑟—牛虻”的身份链接,以正文的修辞化延长,互文性地返回第一部“自杀”的“亚瑟”,并与“牛虻”的身份符号叠印在一起。围绕“亚瑟—牛虻”形成的各种角色关系及其位移,或隐或显、此起彼伏地推动《牛虻》的叙述走完全程。

结语

身份符号区别而又关联着不同的身份主体,使之成为个体进入或撤出社会关系网络的“这一个”,同时也是一种值得研究但未深化细化研究的修辞元素。现实生活和文学活动都有这种修辞元素的生动在场,现实生活中的品牌效应、名人效应,等级差异、贫富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名利角逐、生存博弈,无不关联着这种修辞元素。奇怪的是,人们对身份符号的世俗敏感,较少带入艺术秩序。文本塑造的角色身份,以及指向某种身份的符号,较多地被看作文本整体架构的修辞细节,但文本呈现的艺术事实让我们发现并相信:推动文本建构的修辞细节,叙述能量绝不限于容易观察到的微表情,而属于“为整体的细节”。身份符号不仅仅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称谓”,¹

1 参见笔者:“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文艺研究》5(2008)39-46。

身份符号进入文学叙述,需要进行不限于“纯语言学”的“超语言学”解释。¹ 据此考量身份符号及其角色关系如何推动文本叙述? 身份符号如何为文本叙述积蓄能量并引爆? 希望提供解析某种文本建构类型的广义修辞视角,及其介入“文学生产—消费”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本文的分析在广义修辞学理论框架中展开,涉及三个问题:(1)修辞研究如何介入文学研究? 介入过程中,如何不拘于遣词造句的修辞技巧,开发学术空间?(2)文学研究的修辞开发,内含着需要实践验证的逻辑链: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3)与上述逻辑链平行的问题是:如何整合语言学—文艺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用于某种文本建构类型的广义修辞研究? 以及研究成果如何同时在语言学科和文艺学科的话语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此,我们有过理论与实践的系列探讨²,本文是探索的延伸。

【 Works Cited 】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Narrative Approaches Toward Modern Eth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牛虻》,李俟民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

[Voynich, Ethel Lillian. *The Gadfly*. Trans. Li Liangmin.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2013.]

责任编辑:蒋文颖

1 《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第五卷“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44-350、239-240,多处谈到“纯语言学”研究对文学问题的解释力不足。我们认为巴赫金倡导“超语言学”的文学修辞研究,基于研究对象的学术逻辑,但忽视了“纯语言学”研究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方法论参照,因此从理论阐释到实际操作,我们都强调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平衡的支点,开发学术空间。参见下页注释。

2 参见笔者:“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5(2015)50-57;“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文艺研究》5(2008)39-46;“小说修辞批评:‘祈使—否定’推动的文本叙述”,《文艺研究》5(2013)54-62;“这也是一种X:从标题话语到语篇叙述”,《语言文字应用》2(2011)13-21;“这也是一种X补说:认知选择、修辞处理及语篇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5(2012)95-101。